

#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荆世群

**摘要** 深化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既要深刻理解和阐释该研究的重大意义,又要深入探讨这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视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框架等系列问题。择其要者而言,深化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一是需要明确研究对象,深刻把握该研究对象的概念表达,深入思考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需要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揭示其中的关键环节及逻辑关系;三是需要确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理论框架,以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和历史变革性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理解和阐述,既要恰当表达事后理解的根本目的,也要注意防止陷入历史目的论。

**关键词**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历史分期;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 A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2-0016-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重点项目(23A0756)

2013年1月,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sup>[1]</sup>(P21)这一重大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其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两个具有统摄性、总体性、纲领性、原创性、标识性的理论概念,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主题。此后,虽然学界开始探讨并运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这一概念来分析和说明相关问题,但直接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为主题的学术论著,至今尚不多见,似乎尚未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重要主题。实际上,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皆以不同方式涉及这一问题。就其实质内容而言,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题中之义和重要课题。“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这一概念内蕴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切不可作简单化理解。深化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既需要深刻理解和阐释其重大意义<sup>[2]</sup>,也需要深入探讨其方法论问题,才能增强学术自觉,避免陷入研究误区。从方法论层面说,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涉及研究主体、研究视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框架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仅就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分期、理论范式等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引发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讨论,由此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同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华文明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从研究其“结合的逻辑”提升到研究其“逻辑的结合”,更深刻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魂脉和根脉及其辩证统一的历史基础,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思想坐标。

## 一、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首先要明确其研究对象,深刻把握其概念表达,深入思考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间的互动关系,避免陷入方法论盲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集中表达其研究对象的核心概念。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三个子概念。理解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既要理解其子概念,更要有一个总体把握。这里虽然不可能详细考察这些概念的复杂内涵及其演变过程,但根据研究主题,择其重点略加阐述,对于突破那种望文生义的简单化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

### (一)“中国”概念的基本内涵

对于“中国”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当然并不陌生,而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称谓、一个名称、一个概念,甚至已达到“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不过,熟知非真知。如果让我们系统地阐述这个概念,说出其一套来龙去脉的道理来,恐怕又是大多数人力所不及的。即使是专门从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常常只把这个概念当作一个不言而喻的透明概念来使用,很少追究其来龙去脉和复杂内涵。正如有学者所说:“我们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很多人是在不加讨论,不加前提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中国’这一概念,以至于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sup>[3]</sup>实际上,“中国”这个概念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演变过程,充满历史文化的层层积淀,具有深刻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内涵。有学者总结说,历史上的“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所指,主要经历了从核心政治地域名称、分布在核心政治地域民族名称,最后作为国家名称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意义则是统一多民族中国从黄河中下游向东亚地区发展的历史过程<sup>[4]</sup>。深刻认识“中国”的丰富内涵,必须系统分析和阐述其历史演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指出:“古代中国是在历经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后才获得并发展起它典型的特征的。此后它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实体,难以区分为历史学家所钟爱的‘时期’。”<sup>[5]</sup>(P179)布罗代尔强调“古代中国”通过“历经一个非常长的时期”而成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且具有长期稳定性,自有其真知灼见,但他突出了“古代中国”的总体特征而忽视了其历史性变化。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具有自己核心区域和典型特征的社会共同体、历史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之共名,具有历史整体性、社会整体性、多元一体性等鲜明特征。有学者特别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整体性和国家政权统一性,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整体性以国家政权统一性为前提,国家政权统一性则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sup>[6]</sup>。有学者则特别强调中国之核心区域的稳定性,认为“维持这个核心区域的稳定,从秦汉以来主要依靠的一是制度,二是文化,三是社会,当然还有共同历史”<sup>[7]</sup>。“中国”这个概念既非不言而喻,也非无迹可寻;既非一成不变,也非飘忽不定。它所指称的对象既具有无与伦比的核心稳定性、历史连续性和文化统一性、文明统一性,也富有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内容。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蕴含“古今一体”和“古今之变”的复杂关系,有其深厚悠久的历史基础和文明根基。

### (二)“社会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

探讨“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我们或可会想起与之相联的一系列概念,如“社会规律”“社会形态”“社会运行”“社会稳定”“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进化”“社会变革”,等等,这些概念具有家族相似性,需要相互阐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中,“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指一定的社会从一种较低级的社会形态向另一种较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变过程和历史结果,特别突出其变革性与方向性,特别突出新社会形态取代旧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变环节。无疑,我们思考和运用“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尤其需要注意把握这一核心内涵。同时,我们更需要注意,社会变革总是具体社会的变革而非“一般社会”的变革,其基本前提是这一具体社会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足以维持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否则,社会变革就会失去其主体和对象,成为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例如,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变革总要指向

“中国”这一具体社会的社会变革。中国虽历经多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却仍然有其历史连续性,如此才能形成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再如,我们研究苏联社会变革总要以苏联存在为基本前提,苏联解体以后,就不再会有什么苏联社会变革了。

总体而言,一定社会的社会发展包括社会延续与社会变革两个层面,是社会延续与社会变革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及其“动静之道”。过度突出社会发展之变革性,就难以把握社会发展之“常”;过度突出社会发展之延续性,就难以把握社会发展之“变”。从历史长时段视野看,社会发展过程更明显的特点是“延续”与“变革”的辩证统一。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特别重视探求和遵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之道”“可大可久之道”“变通之道”。或许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发展才会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成为举世罕见的巨型社会政治实体、庞大民族实体、悠久文明实体。

### (三)“历史逻辑”概念的基本内涵

对于“历史逻辑”这个概念,我们似乎更难以把握,同样会想起一系列有其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如“历史规律”“历史法则”“历史演进”“历史线索”“历史轨迹”“历史之道”,等等。一般而言,逻辑重在依据前提和规则进行推理和论证,可从已知推出未知,从混杂把握秩序,依正常识别反常。那究竟该如何把握历史逻辑呢?历史逻辑是历史本身固有的内容还是人们把握历史的一种方式?抑或兼而有之?这里或可借助学界对“历史线索”这一相近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来把握“历史逻辑”。有学者指出,“所谓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串于阐述历史的首尾,有似绳索贯串钱物”;“历史线索不是外注的,而是历史自身所固有;也不是离开人的认识由它自己报称的,而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复认识和探索的结果”<sup>[8]</sup>。历史线索既是历史本身固有的内容,也是人们认识历史的方式和结果。同理,历史逻辑既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内容和性质,也是人们把握历史的方式和结果。这里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历史逻辑总是某一具体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而非“一般社会”的历史逻辑。

比较而言,“历史逻辑”这一概念的定位似乎介于历史规律和历史线索之间。相比历史规律而言,它更突出一定社会发展历史的主体维度及其合目的性,相比历史线索而言,它更强调一定社会发展历史的客体维度及其合规律性,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其历史环节的逻辑把握,而不是对某种一成不变的逻辑公式的理解,集中体现了一定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既蕴含客观规律性,又蕴含主体选择性;既具有反映性,又具有反思性;既具有描述性,又具有规范性。

### (四)“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概念的基本内涵

综合上述思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和界定“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这一概念的主要内涵,即“中国”这一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体”或“社会生命体”(包括社会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等),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呈现的“动静之道”,包括“延续之道”和“变迁之道”,具体展示为前后相续地从一个历史节点到另一个历史节点、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变过程及其历史轨迹,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变通之道”。这里有必要强调,总体把握“中国”这一社会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深化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课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个体与共同体”是马克思“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对基本范畴”,体现了他“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维度”<sup>[9]</sup>。突出中国的共同体属性,特别是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既能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范围,又能彰显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主体维度。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界定,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理解和界定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则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sup>[10]</sup>另一种观点则是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理解和界定为“有史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并突出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

逻辑,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凝聚力量和生命活力,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追求民族复兴的不懈奋斗,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sup>[11]</sup>上述两种观点略有差异,相比而言,后一种观点更为可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显然只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重要内容而非其全部内容,它根植于更为久远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同时,上述两种观点皆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视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重点内容,这倒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里不仅涉及如何理解和界定“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主要内涵问题,而且涉及如何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方法论问题。这一点本文随后再议。

#### (五)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国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业已形成其特定的历史逻辑,但绝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逻辑公式的历史展开,因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只能采取“从后思索”的方法。尽管我们在阐述中国历史时,常以“自多少年以来”或“自古以来”开头,但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及其历史逻辑的理解,我们总是在事后立足于自身所处特定社会环境进行的,具有由果溯因的回溯性、倒推性和反思性,并由此确定其“古”到底有“多古”。不同时代的人们各有其不同的“古代”。历史逻辑不是“逻辑的事物”而是“事物的逻辑”,不是“先验逻辑”而是“经验逻辑”。我们不可能在事先而只能在事后,才能理解和提炼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必然处境和主要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sup>[12]</sup>(P93)。

关于这种事后追溯、后见之明的方法论,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sup>[13]</sup>(P705)社会发展过程虽然不能与生物进化过程简单类比,但社会发展历史研究和生物进化历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却有其共同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正是以“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关系为喻,理解和阐述高级社会形式和低级社会形式及其关系。我们立足某一社会“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的事后理解以及阐述其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无疑可以更清楚地识别和理解其“征兆”及其“发展到充分意义”的历史过程和前因后果,由此连贯起来而形成对某一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总体理解和把握。这种从其“完成的结果”出发来理解社会发展历史的思想方式,既有其贯通历史和现实、把握因果关系的后见之明优势,也容易将我们现在的认识 and 期望强加给特定历史,甚至滑入“历史目的论”的思想陷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种回顾性认知中,研究者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思维误区,产生目的论认知幻象”<sup>[14]</sup>。强调“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并不意味着“人体解剖”可以代替“猴体解剖”,而是要在对“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猴体”蕴含的“人体”的“征兆”;若把“猴体解剖”视为“人体解剖”的投射,就陷入目的论了。

人们进行历史研究有其不同目的。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就会建构出不同的历史面目。历史研究者容易将其历史研究目的虚构为历史本身的目的,提出各种“历史目的论”。可以说,“历史目的论”是我们研究和阐述历史问题时,最容易陷入的一种思想幻觉。实际上,“历史目的论”是人们对历史进行片面理解的表现和结果,它实质上是将我们当前的认识 and 期望强加于历史的思想结果。马克思指出:“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sup>[15]</sup>(P706)这里,马克思强调,一个社会只有进行深入的自我批判,才能避免对自身历史作片面的理解,才能避免陷入“历史目的论”的思想陷阱。

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理解和阐述,既要恰当地遵循和表达事后理解的根本目的,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历史基础,也要注意防止陷入对历史作片面理解的“历史目的论”,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特别是要深入反思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及其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必须具备深刻的自我反思性和自我批判性,才能避免陷入上述思想幻觉、思想陷阱。

## 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业已形成其独特的历史逻辑,问题是如何把握和阐述其历史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经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传世历史文献,并不断出土新的考古历史资料,且目前正处于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进程中。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这个无比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会选择不同的历史资料,形成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引发无数争论,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论说同一个对象,或可谓“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正如有学者所说:“历史学家们根据各自所发现的不同意义链和问题链叙述了不同的历史故事,因此我们阅读到的历史呈现为重叠的多维时空,虽然只有一个世界,却有多种历史叙事,于是世界在历史中变成复数。”<sup>[15]</sup>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及其逻辑呈现。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必须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这一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统一整体,划分为若干历史时期,并由此揭示其中的关键环节及其逻辑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

### (一)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分期的重点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分期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有学者指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分期问题,晚清以来学界实现了两次转型,即“从中国传统以王朝为单位的编纂模式到近代西方线性进步三分法,再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分期”;“第一次转型适应了中国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需求,第二次转型则是在民族独立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sup>[16]</sup>。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分期问题是事关中国道路探索的重大问题,是分析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基本前提。“历史研究者需要对历史的进程有一个解说,需要对复杂的历史进程有一个条分缕析的讲述,需要建立逻辑上的递进关系”<sup>[17]</sup>。历史分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前后相续的各个历史时期建立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以便更好地分析和阐述特定社会在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社会规律、历史逻辑及其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更清晰地呈现其整个历史脉络、历史轨迹,而不是人为地割断历史,将历史整体碎片化、片段化。

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思考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重点,在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和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因此,关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或时代划分,其中对“古代”“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是最为重要的。1952年6月10日,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上溯到二千余年前去纪念陈胜吴广,则太远了,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sup>[18]</sup>(P400)毛泽东明确强调,“中国现代的革命”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时期,但不能上溯到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鲜明地表达了他关于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意识,也蕴含了他将古代和现代明确区分开来的历史分期意识,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

在很长时期内,在很多情况下,学界并没有严格清晰地区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近代”与“现代”,而往往是一体言说,或谓“近代以来”或谓“近现代”。因此,有学者强调,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近代化阶段与现代化阶段区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现代化”与“近代化”这两个概念尽管联系密切,但各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在清楚地界定后,有同时使用两者的必要。中国近代化阶段主要指1860年至1949年资本主义近代化(早期现代化)阶段;中国现代化阶段主要指1949年至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sup>[19]</sup>。这种历史分期有助于突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阶段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划时代的意义。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近代”与“现代”历史时期划分先后形成两种界定。一种是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时期界定为“中国近代史”,与此相应,把从五四运动到现在

这一段历史时期界定为“中国现代史”；另一种是把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界定为“中国近代史”，这种历史分期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起来的。有学者指出：“如今，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sup>[20]</sup>与此相应，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一段历史时期界定为“中国现代史”。例如，有学者指出：“从原始社会早期到封建社会晚期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是中华古代思想历史大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中华古代传统思想向中华现代思想转折的中华近代思想历史大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中华现代思想历史大段。”<sup>[21]</sup>

## （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分期的断代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起点和终点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对于近代史的开端，历来存在多种认识，如着眼于政治架构和社会经济的宋代近世说、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下的晚明说、侧重中西遭遇的鸦片战争说、基于思想文化论域的甲午战争说，以及更加显性的国体变更下的辛亥革命说等”<sup>[22]</sup>。总体而言，目前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的历史起点已大体成为共识，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可以说，“近代”概念集中表达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大转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发生“历史大转折”和“逻辑转换”的历史时期和重要标志。有学者指出：“在西方，‘近代’是指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在东方，尤其在中国，‘近代’则指西方现代文明（现代性和现代化）。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一个编年史的概念，而是一个有强烈价值附加的文化政治概念。”<sup>[23]</sup>上述论断确实令人深思。中国社会正是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巨大冲击下被迫进入“近代”，并造成了“古今之别”和“落后于时代”的历史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突破历史困境的曲折探索和艰辛奋斗。

“近代”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过渡时期”，上“近”中国传统社会，下“近”中国现代社会，虽然具有“强烈价值附加”和“文化政治意涵”，虽然表达了中国失去“自身时代性”的世界历史处境，但毕竟是具有自己“特殊内容”的历史时期。正如有学者所说，“近代既连接古今，又区隔古今，对于古代是异类，对于今天是某种意义上的开端”；“古今悬隔的问题由此突显，近代的枢纽地位因此愈发重要”<sup>[22]</sup>。因此，我们仍不妨将之作为“一个编年史的概念”来使用。另外，学术界还存在着其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不同界定和划分，尤其是对于“当代”概念的界定、理解和运用更是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对于思考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而言，“当代”这个概念可以与“现代”概念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或者纳入“现代”概念而一体言说。

人们根据自身不同的现实处境、时代需要和历史认识等多方面因素，自然会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进行不同的历史分期或时代划分，不可能一成不变。一般而言，学界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笼统地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或中国传统社会，只是不同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起点有其不同的界定和理解。一些学者将之上溯到原始社会早期，一些学者将之上溯到夏商周三代，一些学者将之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学者则将之上溯到秦汉时期，如此等等，说法不一。例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经历了原始公天下时代神农与五帝的‘氏族封建’、家天下时代夏商的‘氏族封建’走向周代的‘宗法封建’、秦朝‘废封建’、汉代迄清‘半封建’的演变历程。”<sup>[24]</sup>我们思考和阐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起点和对象。就此而言，将中国古代社会上溯到秦汉时期就已经足够了，尚不必追溯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鸿蒙时代。当然，如果能够追溯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远古时期，并由此更为清晰地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起源，自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更完整地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及其独特性。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期：1. 早期中国；2. 帝制中国；3. 人民共和国。三期连续发展，又不断进化升级”<sup>[25]</sup>。这种历史分期虽然表面上跳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通常采用的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分期框架，但也不难找到两者可呼应或对应之处，对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三）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基本框架

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立足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简要地将之

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程和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历程。与此相应,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划分为三个阶段、三种类型,即中国古代社会(或谓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和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或者依据马克思借用地质学的说法,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中国社会发展的原生历史逻辑、次生历史逻辑和再次生历史逻辑,或许更能表达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性、整体性、层次性、连续性而无“断裂之虞”。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按照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段历史时期划分,考察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

实际上,上述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作出的一种历史分期。其他不同的历史分期,则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依据而作出的。人们对历史分期的不同理解和划分实际上反映了其理论分歧。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既表达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基本理解,又是其分析和阐述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有学者指出,一般社会科学更关注“常”,重视普适性法则和普遍意义;而历史学则更关注“变”,重视转折点和分水岭,强调因时因地而异。但这样也容易漠视潜存于剧变表层之下的历史深层结构。近现代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大体属于短时段的范畴。在短时段的视野中,容易发现历史的剧变和突变,而不易察觉历史的渐变和不变<sup>[26]</sup>。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自当采取大历史长时段视野,虽可以突出某些特定“短时段”的时代转折意义,却不能以“短时段”自限而与“长时段”割裂开来,需要努力把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结合起来,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深层结构及其历史性变迁和逻辑转换。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公式,而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呈现出来的历史主线,集中表达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之关键历史环节的逻辑关系;即使在经历巨大变革之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依然能够保持其历史连续性,而不是飘忽不定、无迹可寻的神秘之物。把握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既要把握和阐述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逻辑,又要把握和阐述其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化机制和历史连续性,这样才能既呈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又能呈现其阶段性和丰富性;既能呈现其变革递进性,又能呈现其历史连续性。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既非固定不变而始终保持一个面孔,又非一经变革就会面目全非,丧失历史连续性和自我认同。科学合理的历史分期既是理解和阐释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方法论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和强烈历史意识并至今仍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巨型社会实体、文明实体、民族实体、政治实体。无论是对本土人士还是异域人士,认识和理解这一社会实体、文明实体、民族实体、政治实体的运行机制和兴衰之道,无疑都是十分困难、充满挑战性的思想任务。人们可以从不同立场观点方法出发,通过不断“重新发现中国”来把握和理解这一复杂对象,以满足各自需要、兴趣、愿望,并由此展开激烈争论。有学者指出:“历史比较作为分析社会发展的方法,注重以下方面:一是社会发展的方式,是延续性,还是停滞性或跳跃性;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来源,是内在的,还是外部的;三是社会发展的持续性,是制度性的,还是人为偶然的;四是社会发展的线索,是单线,还是复线或者多线。”<sup>[27]</sup>上述提问实际上皆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于理解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无疑很有启发性,但似乎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首要问题,那就是如何科学划分和判定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阶段及其社会性质。离开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将失去其明确的“主体”“对象”和“载体”。

综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必须深入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不同分期或“断代”,势必会呈现不同的历史逻辑,并为不同目的服务。认识 and 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而言,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其历史分期的标准和依据。这就涉及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理论范式问题。

### 三、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理论范式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虽历经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却仍能保持和拓展其可大可久的固有发展轨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再由衰落到强盛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国从强盛到衰落、再从衰落到强盛,都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不仅都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没有前一个历史转变过程,就没有后一个历史转变过程。如果说前者证明中国已经不能再简单延续固有轨道运行,那么,后者则说明中国业已确立了新的发展道路。问题是如何把握、理解和阐述这一系列历史转变过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思潮等众多历史面向中抽绎和凝练为一个较为明晰的历史脉络、历史线索,阐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阐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历史根基。“这种转变是突然爆发的,还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如果是前者,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不可持续;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中国基于长期历史积淀,抓住了重大契机而崛起,其崛起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是可持续的”<sup>[27]</sup>。强大持久的历史连续性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是在这一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因此,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分期,既要注意突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经历的一系列急剧革命性变革,又不能忽视其强大历史连续性。理解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需要确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理论分析框架。迄今为止,学界存在多种分析和说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历史逻辑的理论范式。择其要者而言,主要有社会形态范式、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等。上述研究范式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

#### (一)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社会形态范式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阐述了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为我们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线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分析法强调,要根据其社会形态确定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根据其社会形态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确定其历史分期,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来分析和阐述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实质,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法。社会形态分析方法要求我们,“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统一的层面,审视已有的研究过程和结果,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sup>[28]</sup>。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梳理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清晰脉络,概括提炼出在遵从人类发展普遍规律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形态发展的独特历史和发展道路”<sup>[29]</sup>。“社会形态”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核心概念,社会形态范式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基本范式。

#### (二)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是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它以革命作为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时代主题和中心线索,因而也是近现代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中心和主题;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主流和实质就是革命的历史,正确的理论是革命的理论,评判一切社会运动和思想的尺度就是它们对革命的理解和态度,认为“对革命的理解和正面评价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一切变革的首要前提”<sup>[30]</sup>(P487)。这一范式的优点在于,它突出和确证了中国革命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和基本逻辑。正如有学者所说:“革命史范式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所构建的反帝反封建叙事体系,很大程度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既往历史的区别,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本质,迄今仍然是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叙事体系。”<sup>[31]</sup>其局限则在于,将中国革命过程本身当作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没有突出产生这一革命主题更广阔的世界格局和时代意义。实际上,中国现代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历

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重大步骤。离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就无法深刻说明中国现代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内容和重大意义。

### (三)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目前国内学界所谓现代化范式,主要包括西方现代化范式和中国现代化范式。所谓西方现代化范式是指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 and 参照来说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其基本逻辑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只有在西方现代化运动强烈冲击下,中国才发生根本变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按照西方形象改造自身,最终成为“西方社会”。按照这一逻辑,形成了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西方现代化范式,主要表现为“冲击—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两种模式。前者是“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近代史”,后者是“从时间维度解读中国近代史”<sup>[32]</sup>,两者皆是“以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对比为中心概念而建立起来的,都力图通过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差异来解释中国,这样就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文化的比较稳定持续的属性和特征,即文化的固有特性上,容易使人们对历史采取相对静止的看法”<sup>[33]</sup>。西方现代化范式夸大了中国社会的被动性、静止性、落后性,无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主体性和中国革命运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内生力量,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国革命运动视为“西方影响中国”的历史结果,将中国现代化定位在“西化”上。

我们不能采用西方现代化范式来说明中国近现代历史,更不能以西方现代化范式来取代中国革命史范式。正如有学者所说:“从本质上说,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范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一旦‘现代化范式’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不仅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被轻易地否定,而且,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民族独立的优先地位就必然会在现代化的迷雾中丧失,中国就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中西方资本的捕获物。”<sup>[34]</sup>革命史范式突出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压迫的首要历史使命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而西方现代化范式则突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和典范意义。因此,“作为不同的中国近代史阐释模式,‘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涉及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的认定和把握,更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对未来中国走向可能性的推演和探索”<sup>[35]</sup>。中国式现代化既已破解“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同样需要打破“冲击—反应”和“传统—近代”等西方现代化范式,彰显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内生动力和内在轨迹。

中国现代化范式是以中国现代化运动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主要内容,将中国革命(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放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去定位、理解和评价的,它并不排斥和否定中国革命及其时代意义,而是将中国革命视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必经步骤、重要内容,这样不是缩小或降低了中国革命的意义,而是扩大和提高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统一起来,对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进行全面的审视和理解。“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sup>[30]</sup>(P488)。中国现代化范式是力图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辩证统一起来的理论范式,既强调中国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也强调实现现代化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和目标,又力图克服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弊端,强调中国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克服和超越。“历次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力图依靠其他方式来实现现代性,希望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缺陷和自欺来超越它”<sup>[36]</sup>。中国革命正是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伟大实践。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sup>[37]</sup>(P663),刘少奇称毛泽东思想“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sup>[38]</sup>(P335)。“革命建国”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和首要历史任务。“‘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虽然存在方法论的差异,但仍以寻求历史真相为目标,共同奉行历史客观主义的探索原

则。”<sup>[39]</sup>中国现代化范式力图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统一起来,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不仅在地理空间上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的实践场域,而且推动了从‘单一现代性全球扩张’到‘多元现代性全球共生’的现代化范式革命”<sup>[40]</sup>。

#### (四)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民族国家范式

民族国家范式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范式和中国革命史范式的重要内容,是融合贯通这两种理论范式的综合范式。它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政治表现就是从传统王朝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经过中国现代革命而实现国家重建,经过现代共和国的艰难探索而建立新中国,最终完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不过,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理论借鉴了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理论和历史经验,但我们不能以西方民族国家范式来理解新中国。“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sup>[41]</sup>(P281-282)。中华文明主要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中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具有深厚文明根基,被称为“文明型国家”。

#### (五) 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综合理论范式

上述理论范式或分析框架既有各自的主线、重心和方法,又彼此重叠、借用或呼应;既存在着彼此对立之处,又存在着相互融会贯通之处。比较而言,革命史范式、中国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等理论范式适合把握和阐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关键问题,而难以把握和阐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历史逻辑;只有社会形态范式适合整体把握和系统阐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历史逻辑。因此,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范式为主,借鉴和吸收其他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多维综合的理论分析范式。“每一种范式可以构建出立方体的一个侧面,而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立方体,就要运用多重范式综合分析和研究才能完成”<sup>[42]</sup>。这种多维综合的理论分析范式应该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又要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实际情况,同时注意防止对两者的双重简化或扭曲。这种双重简化、双重扭曲的理解和阐释方式,既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真理性,又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复杂轨迹。有学者批评说:“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显著的一些细节。而在另一方面,那些以确定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而见长的史学家,却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变形走样,引致同侪严重质疑他们的分析是否信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sup>[43]</sup>(P185)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不是要构建某种整齐划一的逻辑公式或历史图式,而是要阐明中国“古今一体”和“古今之变”的核心内容及其内在联系。这就需要综合多种理论范式加以深入分析和阐述。采用某一理论范式的研究并不会使采用其他理论范式的研究显得多余,恰恰相反,采用多种范式的研究,例如通过由近及远、由内向外、近景放大和远景缩小等视野切换,能够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校正、相互检验,实现内外前后远近的视野融合,达成重叠共识和基本共识,厘清其历史脉络及其逻辑链条,不断深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随意套用的理论公式,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不是用来证明和填充某种理论公式的历史材料。“唯物史观之原则或原理的真理性就在于开展出立足于社会—历史之现实的具体化”<sup>[44]</sup>,既不能将“普遍事物的普遍逻辑”同“特殊事物的特殊逻辑”割裂开来,也不能将后者仅仅视为前者的历史例证。针对系统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问题,有学者提出“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既是描绘世界现代化完整图景的基本框架,也是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法论。共性是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的前提,个性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注入活力”<sup>[40]</sup>。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专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还是总体探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皆

必须把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同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不是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强行纳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序列,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变过程,既包括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前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也包括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过程,由此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

#### 四、结论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既要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中提炼和概括其历史逻辑,避免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沦为历史材料考证和堆积的流水账,或热衷于具体历史细节的片段叙事、地方故事、微观叙事,也要摆脱特定逻辑强制,深入探究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具体过程,避免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沦为某种抽象理论公式的逻辑推演或历史建构主义所谓的种种“发明”。有学者在反思和总结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历程时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要偏向是“理论探索有余而实证不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要偏向则是“实证微观有余而理论宏观不足”,“拨乱反正”有些许“矫枉过正”;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当克服偏向,实现“正”(单调理论)与“反”(实证)的“合”(融通)<sup>[45]</sup>。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反思和再审视,就是中国学者力图破除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强制的学术例证。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停滞论”以西方本位和欧洲中心的视角来审视东方社会、将中国定义为落后甚至停滞<sup>[46]</sup>。“中国社会停滞论”是按照西方中心主义逻辑规约和评判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理论结果。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近代国人形成及运用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问题,指出“进化论主导下的近代国人‘向前看’的思维定势,‘向前看’又以‘向外看’为基准,至于基于自身历史的文化传统,也就越来越遥远而不亲切了”<sup>[22]</sup>。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只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思维方式,才能彰显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内生动力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又具有刻意回避宏大历史叙事和理论叙事而走向底层化、地方化、微观化、碎片化的思想倾向,甚至陶醉于种种“历史秘闻”,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微观研究,只有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够“小中见大”而非“坐井观天”。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首先需要回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及其主要以国家形态延续的民族大一统、文明大一统、政治大一统以及经史统一的悠久历史传统。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sup>[47]</sup>(P3-4)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需要持续深入的方法论反思,需要一场能够推动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的“术语革命”和“范式革命”。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具有“术语革命”和“范式革命”的重大意义。“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sup>[48]</sup>(P61)。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尤其要注重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无疑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和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结合,重新构建了中华民族历史书写的底层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sup>[49]</sup>。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旨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转变过程特别是其社会形态转型的关键历史环节及其逻辑联系,找到中华文明可大可久的历史之道,找到得以系统阐述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的历史主线,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创造自身悠久历史和辉煌文明的能动过程和思想智慧,打破中国传统“王朝兴衰循环更替”的历史叙事,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强制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阴影,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旧邦新命”提供历史基础。这就既要注意防止过度突出历史的连续性和同质性,将当代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历史,陷入历史目的论,因为“把目的赋予社会历史,必然导致历史发展宿命化、神秘化”<sup>[50]</sup>,也要注意防止过度强调历史的断裂性和异质性,避免陷入“将历史碎片化、偶然化的历

史断裂论与历史相对主义”<sup>[51]</sup>。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这一具有原创性、总体性、纲领性概念,以其提纲挈领、通观历史的理论高度和历史高度打开了新的历史理解之路,既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提出了明确的研究主题,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坐标。深化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既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所必须的学术自觉和“磨刀之功”,也是其登堂入室之门。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 荆世群.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意义阐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 [3]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贵州文史丛刊,2012,(1).
- [4] 龙晓燕,王文光.地域、民族、国家:“中国”一词作为国家名称的历史过程述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5]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6] 宋培军.再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兼议对中华文明一体性的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
- [7] 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思想战线,2017,(6).
- [8]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3).
- [9] 汪信砚,孔婷.个体与共同体:马克思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对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2).
- [10] 苏伟.再论矛盾分析法中的“五定”要诀——纪念《矛盾论》发表80周年.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3).
- [11] 颜晓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2).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梁孝.反思现代西方“神话”历史:“古希腊起源”、霸权意识和回溯式目的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
- [15] 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哲学研究,2019,(1).
- [16] 刘林海.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 [17] 黄道炫.关山初度:七十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1).
- [18]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9] 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9).
- [20] 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近代史研究,2019,(4).
- [21] 王伟光.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研究编撰中华思想通史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9,(11).
- [22] 余露.古今悬隔与历史是一整个.史林,2023,(4).
- [23] 张汝伦.史学与中国现代性——以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为例.学术月刊,2015,(9).
- [24] 祁志祥.“封建”的历史演变与中国思想史的阶段性征候.学术界,2025,(1).
- [25] 孙闻博.周秦变革与秦汉模式.史学月刊,2025,(7).
- [26] 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11).
- [27] 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7).
- [28] 臧知非.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中国史研究,2016,(3).
- [29] 王伟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红旗文稿,2019,(9).
- [3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1] 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历史研究,2020,(3).
- [32] 张艳国,刘劲松.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误区.学术研究,2013,(12).
- [33]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1).

- [34] 吴波. 社会形态与现代化双重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 (7).
- [35] 董丽敏. “新革命史”: 重构革命史叙述如何可能. 中共党史研究, 2019, (11).
- [36] 阿里夫·德里克. 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 朱泚译. 近代史研究, 2007, (2).
- [37]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8] 刘少奇选集: 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39] 杨念群. 否极泰来: “新史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转型. 近代史研究, 2025, (1).
- [40] 吴志成. 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25, (10).
- [4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5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 [42] 孙代尧, 路宽. 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11).
- [43] 阿里夫·德里克.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1919-1937. 翁贺凯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44] 吴晓明. 论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的具体化实行. 社会科学, 2024, (10).
- [45] 李治安. 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 (5).
- [46] 刘大胜. “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源流发展及其缺失. 史学月刊, 2024, (2).
- [47]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48] 习近平书信选集: 第1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49] 袁年兴, 周藤岭. 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与全球民族历史书写的解构与重构——基于19-21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6).
- [50] 沈江平. 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目的论”的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 2025, (11).
- [51] 郗戈. 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深蕴. 哲学研究, 2025, (9).

## On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Jing Shiqun (Shenzhen University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bstract**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s not only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its great significance but also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its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volved cover a series of aspects, such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research perspectiv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purpose,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path and research framework. To highlight the key points,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s clarifying its research object, profoundly grasping its conceptual expression and thoroughly reflecting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its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purpose. It also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o reveal its key links and their logical rel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act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clarify the main contents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osition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should not only properly expres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retrospective understanding, but also guard against falling into the historical teleology.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theoretical paradigm;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 作者简介 荆世群, 深圳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广东 深圳 518107。

■ 责任编辑 涂文迁